

一個香港家族與中共的 親密合作

王旭

2006年10月28日，香港著名愛國人士霍英東逝世。新華社消息中一句“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道盡其精彩一生。

如今，霍英東雖故去十多年，但與中國共產黨的親密合作，已成為霍家三代人的傳承。

打破封鎖

70年前，新生的共和國面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最嚴酷的禁運政策，禁運種類達2100多種。從事運輸業的霍英東毅然選擇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冒著巨大風險將物資輾轉運往內地。

霍英東長子霍震霆當時僅五六歲。在他記憶中，父親那時很瘦，每天只睡兩三個小時。“但我父親很堅持，對國家有利的事，他一定會做。”

次子霍震寰告訴記者，在別人看來，霍英東是“最笨的”。“因為他運輸的是最便宜、賺錢最少的。但那卻是國家最需要的，其中就有黑鐵皮。當時前綫打仗，黑鐵皮是做汽油桶用的，國家很缺。”

中國共產黨從不忘記在危難之際出手相助的朋友。1964年，霍英東受邀參加新中國成立15週年慶典。

霍震霆說，那是父親第一次到北京，見到了新中國嶄新的精神風貌，也感受到了國家領導人對他的禮遇。

如果說此前幫助新中國是出於樸素的家國情感，那麼此後認同新中國、



報效國家則成為他理念和事業的出發點。

霍英東幫助新中國打破封鎖的故事流傳很廣。霍家長孫霍啟剛認為，在國家最困難時發揮香港所長、幫助國家走出困境，這種“患難之交”是霍家與中共建立合作的基礎和開端。

年齡較小的霍啟文始終記得爺爺對他說過的話：“國家不強大的話，哪怕我們每個人都富有，擁有多少的東西其實都是假的。只有國家強大，才能保護我們每個百姓。”

體育突破

新中國長期受西方全面圍堵，體育是其中一個重要領域。

霍英東熱愛體育。他的幾個孫子都談到，爺爺對他們沒有什麼要求，就是要鍛煉身體。霍啟剛說，爺爺搞

體育，不光是為了強身健體，他看中的是體育的感染力、凝聚力。

20世紀70年代，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新中國逐漸打開對外交往的大門。1974年德黑蘭亞運會給中國突破西方在體育領域的封鎖提供了契機。

霍震霆那時已是父親的左膀右臂，直接參與了一系列重要活動。他帶著香港自行車隊參加德黑蘭亞運會，和父親一道為恢復中國在體育界的合法席位東奔西走，先後幫助中國恢復了在亞足聯、亞羽聯、亞自（自行車）聯等國際單項體育組織中的合法席位，為中國在1979年重返國際奧委會打下了堅實



一個香港家族與中共的親密合作
視頻記者：萬後德、張一弛、王旭

● 霍震寰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 李鋼 攝

基礎。

申辦奧運，是霍英東最大的夢想。

北京拿到 2008 年奧運會主辦權時，健康狀況已不允許霍英東到莫斯科現場。霍震霆電話打到香港時已是深夜：“父親放下電話就去游泳，用一個很簡單的行動表達夢想實現的喜悅。”

當北京奧運會舉行時，霍英東已離世。談到此，霍震霆聲音顫抖：“儘管他沒能看到香港奧運火炬的傳遞，沒能看到香港萬眾一心的熱烈氣氛，也沒能看到壯觀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但中國能圓‘奧運夢’，我覺得對他老人家已經是蠻安慰了。”

實現體育承載的強國之夢，在霍家第三代人身上延續。

“爺爺那個時代是通過體育，希望我們國家在國際上有話語權。”霍啟剛說，“我們這個年代是全民體育的時代。我們一直在思考，怎麼把體育產業弄起來，讓更多老百姓尤其是年輕人參與其中，用體育把社會凝聚力、社會正能量發掘出來。”

霍啟剛還在思考如何藉助體育促進香港與內地融合：“我希望有一天，粵港澳大灣區一起舉辦全運會，甚至申辦世界游泳錦標賽這樣的比賽。”

與爺爺一樣最愛足球的霍啟山，心中有一個世界杯之夢：“我作為執委參與亞洲足協，幫助國家爭取到了 2023 年亞洲杯，希望下一步爭取世界杯來到中國。我們一定可以在國際體育舞台講好我們的中國故事。”

改革先鋒

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霍震霆清楚記得，就在聽到三中全會召開的當天，霍英東作出了在廣東中山興建溫泉度假酒店的決定。

隨後，廣州白天鵝賓館、北京貴賓樓飯店相繼建成，番禺南沙的開發更是傾注了霍英東無數心血。

霍震寰一直幫霍英東做投資。改革開放初期，沒有前路可循，霍英東最多的精力花費在打破常規、為內地開闢新路上：“早期內地涉外酒店，本地人進去要有單位介紹信。我父親說，我們自己人怎麼都不能進自己的酒店？他要求白天鵝賓館向社會開放。這應該是內地第一家向社會開放的涉外酒店。”

霍啟剛回憶：“爺爺總想著如何幫助國家更上

一層樓。比如建北京貴賓樓飯店，是因為北京要辦亞運會。20 世紀 90 年代北京還缺少國際水準的酒店，他希望我們國家第一次迎來這麼重要的運動會時，可以有一個比較靚麗的條件去接待外賓。”

霍英東先後投資 100 多億港元，支持內地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和教育、文化、衛生、體育事業發展。在香港回歸這一重大歷史進程中，霍英東也以他在香港的威望發揮了獨特作用。

對霍英東的貢獻，國家給予高度肯定。2018 年，霍英東獲得“改革先鋒”稱號，港澳人士中只有 5 人獲此殊榮。

談到國家對霍英東的褒獎，霍震霆說：“父親常說，他為國家做的是很小的事，就像對海洋而言的一滴水。”





我覺得講得不夠。回歸 20 多年了，我們這一代有責任多關注、多理解、多貢獻、多參與。”

在霍啟山看來，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使命：“爺爺那一代一直參與改革開放，是協助中國富起來；到爸爸那一代就是協助中國走出去；我們霍家第三代，重要的是在國際舞台講好中國故事。”

在霍啟文眼中，每一代更有每一代的機遇：“到我們這一代，我覺得機遇更多了。你看現在的大灣區、‘一帶一路’，是改革開放的新階段。人民富起來，這就是最大的機遇。”

一代人老去，新一代人接棒。霍家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正在延續，香港新一代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步伐正在加快，潮流勢不可擋！（新華社香港 2021 年 6 月 18 日電）

同舟共濟

1983 年，霍英東罹患癌症，主治醫生建議他去美國治療。

“但他堅決要去內地。”霍震霆說，他更相信我們國家的醫生，相信我們國家的體制，所以去了北京協和醫院。整個過程都能感到中央領導對他的重視，“作為家屬，我們非常感動。”

“這是信任，也是感情。”霍啟剛說。經過醫院的精心治療，霍英東的病情得到了控制，20 年沒有復發。

2006 年，霍英東去世，黨和國家給予他極高的禮遇。如今，霍家第二代寶刀未老，第三代也已走上事業發展的舞台。

對第三代霍家人來說，怎樣做好香港青年的工作，幫助香港青年真正認識內地、認識中國共產黨，是最重要的課題。

已是全國政協委員的霍啟剛說：“今年（2021 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週年，從小紅船開始到現在，共產黨對國家的貢獻、對香港的貢獻，很多故事

微縮模型手藝人： 寫給香港的情書

洪雪華 姚蘭

3年前，香港微縮模型手藝人黎熾明遇到一件糟糕的事情。從香港空運到日本大阪的一件微縮模型碎了一半，那是他用兩三個月的時間精心製作的。

距開展僅剩數日。“開箱時，我心都碎了。”這個安靜靦腆的中年男子激動地回憶道。幸運的是，一起參加展覽的手藝人們伸出援手，幫忙“搶救”那件微縮模型。最終，它驚豔地亮相了。

後來每次參展，只要用貨車運送，黎熾明必定跟車，保證作品安全抵達。像他這樣的全職手藝人，香港只有不到20位。

他和搭檔陳慧姬入行10多年，製作出不少有香港特色的微縮模型：大坑舞火龍、荔園、涼茶鋪、摩星嶺木屋村……

兩位手藝人的兩次“相遇”

採訪當天，陳慧姬化了精緻的妝容，她的眼睛很大，但左眼有白內障，主要靠右眼的視力製作微縮模型。黎熾明則穿著樸素，右手食指上有一個創可貼，藏住了被美工刀劃到的傷口。

兩位手藝人的相識源於一封電子郵件。

2007年，在香港微型藝術會工作的陳慧姬在網站上看到一個帶有旋轉樓梯的建築模型，模型製作者是黎熾明。正逢香港微型藝術會籌辦微縮模型展覽，陳慧姬隨即發電子郵件給黎熾明，邀他參展。

黎熾明接受了邀請。他已從事建築模型行業10餘年，卻是第一次接觸微

●（上）微縮模型手藝人黎熾明（左）和陳慧姬在工作室 王申 攝

●（下）陳慧姬展示微縮模型作品 王申 攝





微縮模型手藝人：寫給香港的情書

視頻記者：洪雪華、姚蘭

縮模型。與一般建築模型不同，微縮模型更重視作品細節。白天他忙於本職工作，晚上便在公司工廠裏趕製作品。

兩個月內，黎熾明用膠板等材料製作出第一件微縮模型“和昌大押”，如期交給陳慧姬。“和昌大押”的原型唐樓建築位於香港灣仔，已有超過 100 年歷史。

陳慧姬更早入行。2003 年，從事會計工作的她已是一名兼職微縮模型手藝人，忙於開班教學。2017 年，兩人再次相遇，決定合辦工作室。

工作室成立初期資金不足，他們咬牙賣掉了 10 件微縮模型。為了維持日常開支，他們一邊教學一邊製作新作品。

二人分工明確。黎熾明負責微縮模型中的建築及能動的東西，如轉動的風扇、閃爍的霓虹燈、播放音樂的電視機等。陳慧姬擅長製作食物、店鋪、攤位等細節，用黏土製作出逼真的微縮食物模型，有半透明的魚翅、金黃的菠蘿包等。

剛入行時，同一件微縮模型，陳慧姬要製作五六遍才滿意，技術嫻熟後只需兩三遍。模型的微縮比例依展覽或客戶要求而定，最小的食物模型僅有指甲般大小，最大的微縮模型有數米高。

據介紹，微縮模型始於 18 世紀初，源於歐洲，後漸為各國貴族喜愛。香港微縮模型藝術吸收了本地特色，更貼近市民生活。

入行需要天分，更需後天努力，香港微縮模型手藝人們大多靠自學。“我們很幸運把興趣作為職業，會珍惜這份工作。”

與時間賽跑

黎熾明和著名演員劉德華面對面交談過 4 次。劉德華找他定做 5 件大型微縮模型，有 4.5 米高的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大樓、6 米長的青馬大橋。

回顧十幾年的手藝人生涯，他們會用一個字來形容——趕。

今年 2 月，“惜於微時——香港故事縮影展”在尖沙咀 1881 公館舉行，

● 正在製作微縮模型 王申 攝



兩人製作的 21 件微縮模型展出，其中 9 件作品是在 2 個月內趕出來的。還有一次，一位展覽負責人要求 5 天內交作品，黎熾明在工作室裏擺了一張摺疊床，最辛苦時，每天只能睡一兩個小時。

工作室位於九龍一棟工業大廈的二樓，約有 100 平方米，每月租金 1.1 萬港元。推開大門，微縮模型佔了工作室一半空間，一張 2 米多長的工作台擺放在右側。左側角落，幾件微縮模型後面，是黎熾明的辦公桌。

現實不允許他們慢下來。黎熾明和陳慧姬商量，製作出三四件相同的作品，借出展覽或者賣掉幾個，可以獲得收入。

黎熾明決定做第三件“和昌大押”微縮模型，前兩件已賣出。他還有三樣作品——冰室、涼茶鋪、髮廊，每樣作品大概有相同的 5 件。陳慧姬一般會製作 15 件同樣的微縮食物模型，最小的微縮模型也需要花費兩三個小時。

其實，手藝人們不喜歡做同樣的作品，但這種複製是為了生活。

疫情期間，香港特區政府推出多輪“保就業”計劃，接受僱主和自僱人士申請。黎熾明和陳慧姬的工作室申請過兩次，用於支付房租和日常開銷。



寫給香港的情書

每天早上 7 點公共廚房開門，負責一家人飯菜的媽媽們便衝出房門，搶佔廚房的一席之地，她們一邊烹飪一邊聊家常。這是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最早一批公屋——“七層公屋”裏的生活場景。

黎熾明的童年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住在同一層樓的孩子們到處串門，有人在家裏大叫一聲，熱情的鄰居會結伴跑去探望。後來，公屋拆掉了，全家人從筲箕灣搬到銅鑼灣，卻見不到那樣的畫面了。

他製作過一件地下城的微縮模型，作品靈感來源於“七層公屋”。幼時父親經常帶黎熾明去摩星嶺木屋村。父親已去世兩年多，摩星嶺木屋村也已不復存在，他用微縮模型將之還原出來。

兩年前，因兒時家境普通而少去遊樂場的黎熾明，製作了一件微縮模型“童夢中的遊樂場”。通電後，“遊樂場”內燈光閃爍，摩天輪和旋轉木馬轉

動了。

對香港的記憶，都隱藏在這些微縮模型中。黎熾明和陳慧姬的微縮模型大部分與香港有關，有冰室、髮廊、戲院等。他們覺得這樣市民才有認同感。

老人是微縮模型展覽的常客，還有老人坐著輪椅，拄著拐杖來看展。他們停留在一件件微縮模型前，欣喜地說：“這就是我們以前生活過的地方！”

“趁著現在還有能力，儘量多做點，多保留點回憶。”黎熾明指著頭頂的白髮說。也許等到視力模糊、雙手顫抖的那一天，他們才會離開這一行吧。

工作壓力大時，黎熾明會拿上幾瓶啤酒，跑到工業大廈的天台，站在天台上俯瞰城市，觀察著每一處細節，就像看著那些心愛的微縮模型一樣。（新華社香港 2020 年 12 月 27 日電）

- “80 後” 旗袍設計師余嬾設計的“十全十美青花蝴蝶牡丹旗袍”在香港會展中心展示 受訪者 供圖

旗袍在香港的那些事兒

洪雪華 姚蘭

幾年前，有 400 多名香港女人穿上旗袍一同參加了一場音樂會。

每個人的旗袍款式各異，面料有絲綢、羊絨、真絲等，盤扣有細有粗，開襟有斜有直，開衩有高有低。有人手持團扇，有人肩披紗巾，女人們用好奇、驚喜的眼神打量著彼此。

“為喜歡穿旗袍的人提供一個展現美的平台。”“旗袍發燒友”胡玉貞參與策劃了這場活動。六年前，她在香港創辦金枝玉葉旗袍會，主要組織旗袍宣傳活動，會員最初不足 10 人，如今已超過百人。

胡玉貞在活動邀請函中寫道：必須穿旗袍出席。她一年 365 天裏，穿旗袍的日子超過 300 天。

香港還有不少人跟胡玉貞一樣喜歡穿旗袍。現代旗袍形成於 20 世紀 20 年代的上海，至今已有近百年歷史。2021 年，香港中式長衫製作技藝被列入第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旗袍重新吸引大眾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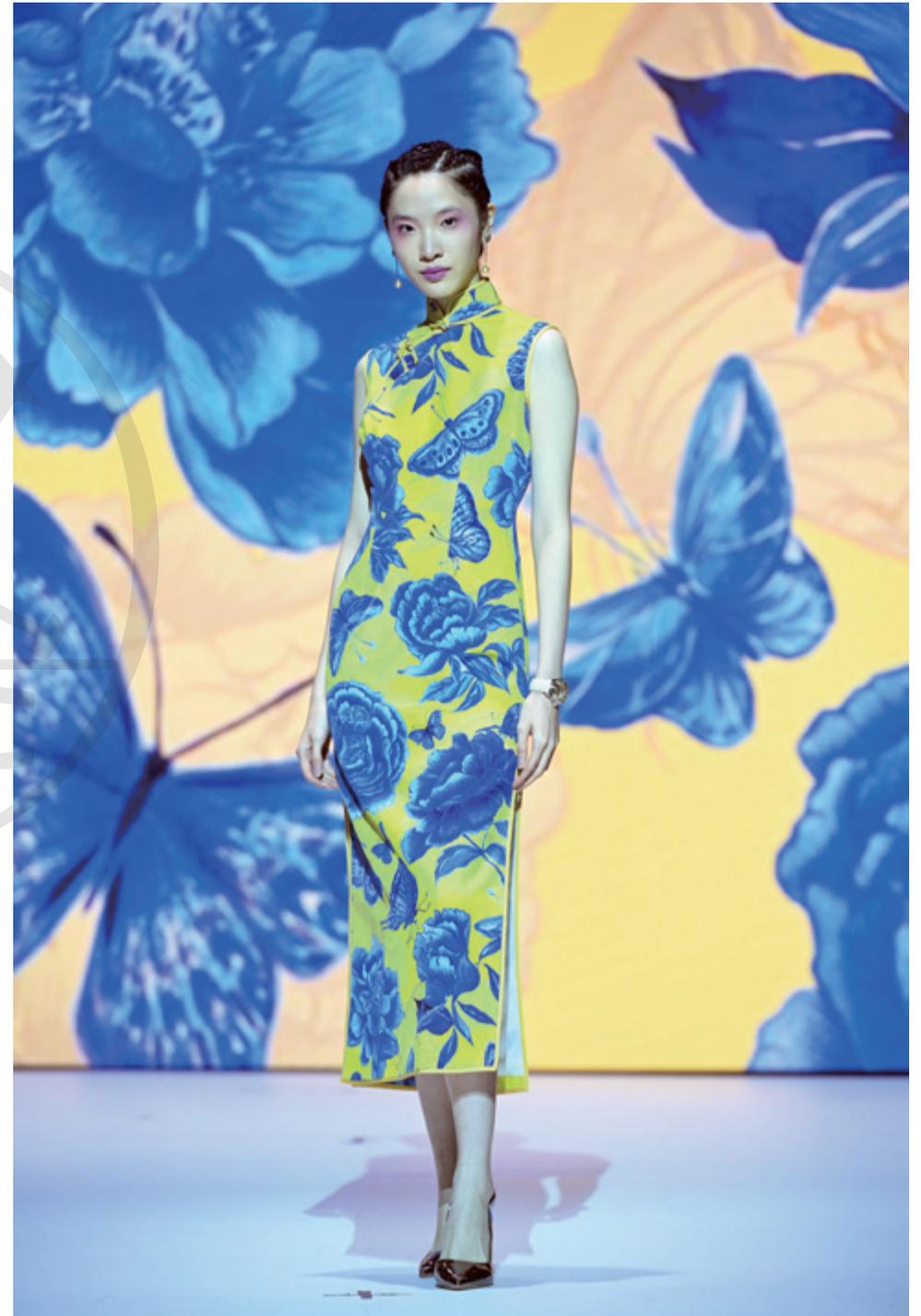
“穿上旗袍後，整個人都不一樣了！”

胡玉貞去過一個旗袍博物館。“湊近仔細看，旗袍上的一朵朵花都是用紅色珊瑚石繡上去的，簡直太美了。”足足一下午，她徘徊在展櫃前。

為什麼喜歡穿旗袍？胡玉貞回答：“穿上旗袍後，整個人都不一樣了！旗袍就像是一種約束，我會特別留意言行舉止。”

採訪當天，她精心打扮了一番：一身墨綠色印花旗袍，右側盤扣上掛著小玉珮，一雙黑色圓頭高跟鞋，絲綢口罩上還有繡花。

胡玉貞想讓更多香港人喜歡穿旗袍：她在養老院組織旗袍活動，讓 60 位





65 歲以上的老人穿上旗袍，拍攝美照；她參與策劃活動“愛在黑暗中找美”，邀請香港旗袍設計師余嬺為 6 位盲人女性量身設計旗袍，幫助她們找回自信……

現代旗袍融合了中西方文化審美，最初風靡於上海，而後傳到香港、台灣等地，在兩岸及港澳地區落地生根，其承載的美也成為一種共識。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旗袍在香港迎來發展時期，香港人習慣稱之為長衫。有女白領和教師穿著素色旗袍上班；喜慶場合有女性身穿華麗旗袍；還有學校以藍色、白色旗袍作為女學生校服，當前仍有十幾所學校延續此傳統。

旗袍老裁縫的“高光時刻”

胡玉貞整理了一份“旗袍大師資料”，介紹香港現存 6 位旗袍裁縫師的祖籍、入行時間、資歷、年齡、代表作品、手藝傳承、工作室等信息。



旗袍在香港的那些事兒
視頻記者：蔣佳璇、譚佳銘

這其中，就有 89 歲的梁朗光，他曾為電影《花樣年華》製作旗袍。

梁朗光為演員張曼玉做旗袍是機緣巧合。

電影《花樣年華》將淡色、深色、鮮豔等不同風格的旗袍融入鏡頭語言，反映女主角蘇麗珍的心路歷程。

開拍前，擔任服裝及美術指導的香港著名設計師張叔平經引薦，找到了梁朗光。兩人達成共識，旗袍由張叔平設計，梁朗光製作。

張曼玉忙於拍戲，梁朗光在片場為她量身，還要做紙樣、裁布、包邊、夾裏、緝邊等，每道工序都不敢馬虎。歷時兩年，梁朗光製作了 30 多件旗袍，電影中展示了 20 餘件。

2000 年電影上映後，有觀眾評價：“這是一部旗袍電影！”他因此名聲漸起，顧客聞風而至，訂單接踵而來，迎來職業生涯的“高光時刻”。

“張曼玉穿得非常自然！”這位老裁縫說，合身的旗袍就是最好的旗袍。

梁朗光十三四歲從廣東佛山來到香港，最初在中環一間裁縫鋪裏當學徒，苦心學藝方可出師謀生。後來，他辦起工作坊，最多時有十多位裁縫作為幫手。工作坊內燈光時常亮至深夜，裁縫們手中的銀針在布料間穿梭遊走，兩三天便能做出一件旗袍。

到了 21 世紀，旗袍的火熱時代漸漸過去。梁朗光關閉了運作多年的工作坊，輾轉搬到位於觀塘一棟工業大廈的工作室，不足 40 平方米。

工作室的牆上掛著七八張照片，有梁朗光和張曼玉、鞏俐的合照。約一米長的工作台上放著軟尺、剪刀、紙片、布料、熨斗等，老式縫紉機緊挨著工作台。

60 多年，上萬件旗袍。如今，這位年近九旬的老裁縫一個星期工作六天，每天早上 10 點開始，下午 5 點離開，每個月只做兩三件旗袍。

訂單冊裏也有內地顧客的尺碼，因為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訂單基本沒有了。為了防止忘記重要信息，他會在訂單頁畫上旗袍草圖，貼上相應的布條。

為什麼堅持做旗袍？在女兒梁媛雯看來，旗袍曾為父親帶來名譽和收入，如今是他老年生活裏的一種陪伴和寄託。“他真的很喜歡這份工作。”



袍在香港設計，在杭州或深圳等內地城市製作。

從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紡織及製衣學系畢業後，余嬪主要為各大商業機構設計制服。為了提高旗袍製作手藝，她想找梁朗光拜師。

因年事已高、精力有限，梁朗光婉拒了余嬪。

而另一位經驗豐富的旗袍裁縫師秦長林則忙於收徒授課，希望藉此傳承旗袍文化。為了專注教學，他每次只收 4 名學生。

“只要他們用心學，我全部教給他們。”秦長林還參與了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與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共同舉辦的“香港中式長衫製作技藝傳承計劃”，更多年輕人聞訊趕來。

儘管不再是香港人的主要日常服飾，但這些熱愛和守護旗袍的人相信，承載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的旗袍只要存在一天，一定還有人穿。美是永恆的。
(新華社香港 2021 年 10 月 3 日電)

把中國傳統文化縫進旗袍裏

旗袍的世界裏，有老裁縫們的堅守，也有年輕設計師的探索和創新。

“80 後”的余嬪曾為三個年輕的香港姑娘設計旗袍，姑娘們穿著旗袍跳起了街舞。在她的設計理念裏，傳統與現代的風格融合十分吸引人。

余嬪有一件得意作品——“十全十美青花蝴蝶牡丹旗袍”。她手繪青花瓷藍色的十隻蝴蝶和十朵牡丹，利用數碼印花技術，將圖案點綴在金黃色旗袍上。

她翻閱古籍，奔走於各類文化講座，以此尋找靈感。“服裝設計需要把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視覺化，不能停於表面。”她用寓意吉祥的“石上大雞”設計了一件無袖旗袍，也將梅花、茉莉等常見元素縫進旗袍裏。

位於佐敦的裕華國貨內，余嬪租了一個店面，疫情前的正常年份，一年可以賣出 100 多件旗袍。五年前，她創建了主打旗袍的服裝品牌，大部分旗